



贴秋膘

汪曾祺

人到夏天,没有什么胃口,饭食清淡简单,芝麻酱面(过水,抓一把黄瓜丝,浇点花椒油);烙两张葱花饼,熬点绿豆稀粥……两三个月下来,体重大都减少一点。秋风一起,胃口大开,想吃点好的,增加一点营养,补偿补偿夏天的损失,北方人谓之“贴秋膘”。

北京人所谓“贴秋膘”有特殊的含意,即吃烤肉。

烤肉大概源于少数民族的吃法。日本人称烤羊肉为“成吉思汗料理”(青木正儿《中华腌菜谱》里提到),似乎这是蒙古人的东西。但我看《元朝秘史》,并没有看到烤肉。成吉思汗当然是吃羊肉的,“秘史”里几次提到他到了一个什么地方,吃了一只“双母乳的羊羔”。羊羔而且是“双母乳”(两只母羊喂奶)的,想必十分肥嫩。一顿吃一只羊羔,这食量是够可以的。但似乎只是白煮,即便是烤,也会是整只地烤,不会像北京的烤肉一样。如果是北京的烤肉,他吃起来大概也不耐烦,觉得不过瘾。我去过内蒙古几次,也没有在草原上吃过烤肉。那么,这是不是蒙古料理,颇可存疑。北京卖烤肉的,都是回民馆子。“烤肉宛”原来有齐白石写的一块小匾,写得明白:“清真烤肉宛。”这块匾是写在宣纸上的,嵌在镜框里,字写得很好,后面还加了两行注脚:“诸书无烤字,应人所请自我作古。”我曾写信问过语言文字学家朱德熙,是不是古代没有“烤”字,德熙复信说古代字书上确实没有这个字。看来“烤”字是近代人造出来的字了。这是不是回民的吃法?我到过回民集中的兰州,到过新疆的乌鲁木齐、伊犁、吐鲁番,都没有见到如北京烤肉一样的烤肉。烤羊肉串是到处有的,但那是另外一种。北京的烤肉起源于何时,原是哪个民族的,已不可考。反正它已经在北京生根落户,成了北京“三烤”(烤肉、烤鸭、烤白薯)之一,是“北京吃儿”的代表作了。

北京烤肉是在“炙子”上烤的。“炙子”是一根一根铁条钉成的圆板,下面烧着大块的劈材,松木或果木。羊肉切成薄片(也有烤牛肉的,少),由堂倌在大碗里拌好作料——酱油、香油、料酒、大量的香菜,加一点水,交给顾客,由顾客用长筷子平摊在炙子上烤。“炙子”的铁条之间有小缝,下面的柴烟火气可以从缝隙中透上来,不但整个“炙子”受火均匀,而且使烤着的肉带柴木清香;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填入缝中,增加了烤炙的焦香。过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。因为炙子颇高,只能站着烤,或一只脚踩在长凳上。大火烤着,外面的衣裳穿不住,大都脱得只穿一件衬衫。足蹬长凳,解衣盘礴,一边大口地吃肉,一边喝白酒,很有点剽悍豪霸之气。满屋子都是烤炙的肉香,这气氛就能使人增加三分胃口。平常食量,吃一斤烤肉,问题不大。吃斤半,二斤,二斤半的,有的是。自己烤,嫩一点,焦一点,可以随意。而且烤本身就是个乐趣。

北京烤肉有名的三家:烤肉季、烤肉宛、烤肉刘。烤肉宛在宣武门里,我住在国会街时,几步就到了,常去。有时懒得去等炙子(因为顾客多,炙子常不得空),就派一个孩子带个饭盒烤一饭盒,买几个烧饼,一家子一顿饭,就解决了。烤肉宛去吃过的名人很多。除了齐白石写的一块匾,还有张大千写的一块。梅兰芳题了一首诗,记得第一句是“宛家烤肉旧驰名”,字和诗当然是许姬传代笔。烤肉季在什刹海,烤肉刘在虎坊桥。

从前北京人有到野地里吃烤肉的风气。玉渊潭就是个吃烤肉的地方。一边看看野景,一边吃着烤肉,别是一番滋味。听玉渊潭附近的老住户说,过去一到秋天,老远就闻到烤肉香味。

北京现在还能吃到烤肉,但都改成由服务员代烤了端上来,那就没劲了。我没有去过。内蒙古也有“贴秋膘”的说法,我在呼和浩特就听到过。不过似乎只是汉族干部或说汉语的蒙族干部这样说。蒙语有没有这说法,不知道。呼市的干部很愿意秋天“下去”考察工作或调查材料。别人就会说:“哪里是去考察、调查,是去‘贴秋膘’去了。”呼市干部所说“贴秋膘”是说下去吃羊肉去了。但不是去吃烤肉,而是去吃手把羊肉。到了草原,少不了要吃几顿羊肉。有客人来,杀一只羊,这在牧民实在不算什么。关于手把羊肉,我曾写过一篇文章,收入《蒲桥集》,兹不重述。那篇文章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话,即羊肉要秋天才好吃,大概要到阴历九月,羊才上膘,才肥。羊上了膘,人才可以去“贴”。

汪曾祺(1920年3月5日—1997年5月16日),江苏高邮人,中国当代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。

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读《孟子》

梁涛

为什么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读《孟子》?我想从三件事情讲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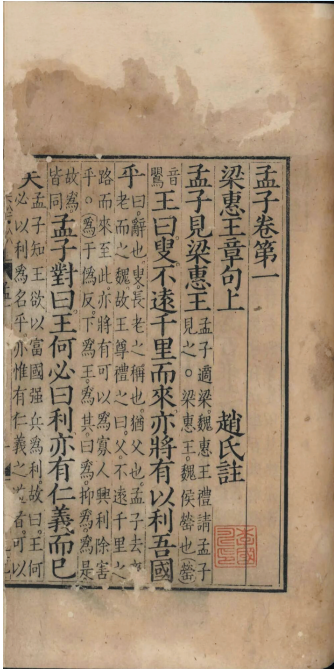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,杨振宁先生说,他十二岁刚上初中,就显示出数学上的天赋。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老师,暑假时,他希望父亲教自己微积分。但杨父没有这样做,而是请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教他读《孟子》,连续读了两个暑期,杨振宁便可以把《孟子》背诵下来了。杨先生后来回忆此事,非常感谢父亲当年的选择。杨先生没有说《孟子》使他受了哪些益,但这个问题不难解释。孟子说: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,惟士为能。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你可以没有固定的财产,甚至穷困潦倒,但你不能改变固定的志向。对于老百姓,我们不能提过高的要求。但对于士人,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,一定要有更高的标准、更高的要求。因为你是社会的精英,代表了社会的良心。我想杨振宁说《孟子》使其受益无穷,应该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。

第二个例子,我们把时间往前拉到东汉末年,当时宦官专政,政治黑暗,社会陷入危机之中。在党锢之祸受迫害的士人中,有一位就与我们今天谈论的《孟子》有关,他是赵岐,孟学史非常重要的人物。读《孟子》,离不开古人的注,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《孟子注》,就是赵岐写的,赵岐参与了反抗宦官专政的斗争,结果全家被杀,只有他自己一人逃脱,只能隐姓埋名浪迹天涯,在北海郡(今潍坊)靠卖饼为生。名士孙嵩有一天在集市上遇到赵岐,问了他的身世之后,把赵岐接入家中以上宾相待。当时形势危急,宦官仍不断追捕逃脱的士人。孙嵩就在屋中砌了一道墙,让赵岐躲藏在夹壁中,一躲数年。如何打发这段无聊而难熬的日子?《孟子注》就是赵岐在夹壁中避难时完成的。“守志厉操者仪之,则可以崇高节,抗浮云。”——赵岐用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证明了读《孟子》的价值和意义。

第三个故事,时间到了南宋末年,元兵攻入了江南。文天祥率兵抗元,失败被俘。他被押送到了大都,关在一个土牢里。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,很多健康的人没几天就去世了,文天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却没有染上任何疾病,还写下了著名的《正气歌》。文天祥的正气,就是来自孟子的浩然之气。他用浩然之气来抵御牢笼中的种种污浊之气,他说:“彼气有七,吾气有一,以一敌七,吾何患焉,况浩然者,天地之正气也。”47岁的文天祥去世后,人们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一首诗,诗曰: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惟其义尽,所以仁至,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,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。”儒学的最高价值原则是什么?是仁义。在仁义精神的激励下,赵岐、文天祥等儒者或反抗强权,或杀身成仁,用他们的生命去践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人生信仰。赵岐的“高节”、文天祥的正气,就是来自于孟子的浩然之气,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尽管仁、义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,但是孟子通过浩然之气,通过大丈夫精神,对仁义做了一个我认为是最为精彩、也最生动的论证。从此以后,仁义、大丈夫精神、浩然之气,深深地刻入了中国人的骨髓,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信念。以仁义为核心,孟子提出“性善论”,塑造了中国人积极乐观、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。提出“民为贵”,一定程度缓解了专制社会的黑暗。提出“天爵”,肯定人格的尊严和平等。这些思想都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来读《孟子》,这就是我的理由和根据。我喜欢《孟子》,还有一个理由。孟子说过:“君子有三乐,而王天下不存焉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“三乐”之中,一乐是“父母俱存,兄弟无故”,也就是家庭和睦。二乐是“仰不愧于天,俯不忤于地”,就是要活得坦坦荡荡。三乐是什么呢?“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,三乐也。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经过努力可以得到其中的两乐,家庭和睦,坦坦荡荡。我比较幸运,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《孟子》,可以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,所以我有三乐。谢谢孟子。

(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)



孟子·十四卷·汉·赵岐·注·宋·孙奭·音义·元·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刊本